

北美館《布列松在中國》展覽

周盈如

前言

參觀布列松展覽帶給我不同的靈魂震撼與感觸，是感動的、是驚喜的、是悲傷的、是喜悅的，但更多的是對布列松大師的深層理解與連結。

我大學的時候就讀台師大的東亞系，當時沈浸在亞洲文化圈裡，受日本東洋、傳統儒家、日韓潮流以及東南亞國協的政經文化的學術洗禮，大四的時候受系上留學美國的教授鼓勵去美加看看，我毅然決然申請加拿大的交換，不同於系上同班同學都去中日韓等國交換，我嘗試跳出亞洲，滿足對其他世界的好奇與憧憬。

不過造訪過美加後，對世界的好奇心是不減反增，像個嗜甜的小孩一樣，一旦嚐到了甜頭，癮頭就更甚以往了。大學學習了亞洲文化、到加拿大 UBC 學習，畢業後工作了幾年，則決心回到歐文所，再進一步探究西方文明的起源—歐洲文化。

因為自己對世界的好奇，我一次次允許自己的任性，踏出熟悉的文化圈與生活圈，用實際的方式去拼湊出自己的世界觀，然而這種跳躍式生命歷程與選擇不見得是台灣社會

的主流，因此有時候也會陷入省思，懷著這一股對世界的好奇心，這種執著是否對個人的成長有意義？更甚者，如果說一個人的成功在於對這個社會做出貢獻，那我這份對世界的好奇心又要如何取得與社會貢獻之間的連結？這些答案在我觀看北美館《布列松在中國》之後，獲得了釋然。大師真實的生命經歷與攝影作品集，使我深受啟發，因此相較該展覽的現場動線與設計，我更關注於反思創作者(文化中介)、藝術行為(攝影凝視)、歷史與記憶等議題，以及串接在一起的關係與其價值。

《布列松在中國》

北美館此次展出的《布列松在中國：1948-1949/1958》是世界巡迴展的首站本展，由米榭勒·費佐 (Michel Frizot) 與蘇盈龍共同策畫，展出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在其紀實攝影(Documentary Photography)生涯中重要作品之集結，尤其著重他踏訪中國時所留下的相關作品，展出約 170 件原版照片，以及相關之書信原件與雜誌。

展覽以攝影專題的方式展出，共有兩個部分，依照時間軸區分，為 1948 年至 1949 年

間，以及 1958 年後，兩者之間相差十年光陰，窺看中國十年間的社會變動。

於 1948 年 11 月布列松接到馬格蘭通訊社轉來美國《Life》雜誌的緊急電報，他們預期國民黨即將潰敗，希望委託布列松前往中國拍攝〈北平最後的日子〉的專題報導，紀錄政權易主的關鍵時刻。當時的中國處於國共內戰狀態，社會動盪，在這些影像中不見戰爭的煙硝，布列松捕捉當時社會的景象，市井小民的生活，以及不同階層、不同工作人群的當時樣貌。

影像不同於文字，視覺的震撼更加直觀，布列松這個時期的照片捕捉到的是中國整個社會經歷現代化轉換之際的動盪與不協調。中國有五千年歷史，自詡為泱泱大國，此時的西方船堅砲利硬是打開了堅守固有傳統的大門，一時間中國被世界局勢所迫，慌忙地想走上現代化的路程，但如同一艘大船要瞬間轉向，談何容易？改變的心越是急切，腳步越顯得踉蹌，布列松的鏡頭下便記錄著當時學生們追求自由的社會運動畫面、人民簇擁在佈告欄牆邊觀看報紙的畫面、滿清遺存的太監被塞鈔票作為拍攝的報酬等畫面，充斥著舊與新的衝擊。

國共內戰十年後，1958 年布列松再次踏訪中國，此次在中國官方人員的全程陪同下，記錄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推進大躍進、人民公社等的重大改革下的社會樣貌。此時的中國與十年前的氛圍有所不同，布列松側拍了如

建國慶祝遊行、學生參與挖建游泳池等畫面，這系列照片向國際展現了中國歷經政權更迭的不同面貌，不過該次旅程有中共當局的介入，影像所呈現的真實性是否如同十年前的作品一樣？我存有一絲懷疑，此時期的照片多透出當時中國社會裡大破大立、人民期待嶄新未來的氛圍。

兩個時期的劃分，策展人以相當敘述性的方式陳設一系列布列松的精選影像，並佐以文字敘述當時的重大歷史事件，搭配各大國際媒體的紙本報導，宛如透過布列松的鏡頭，穿越時空，感受未曾到達過的中國年代與城市。

快門之下的永恆

布列松曾說：「攝影是一種由無止盡的視覺吸引力所觸動的自發性衝動，它既捕捉了瞬間，也留下永恆。」攝影師帶著相機走入歷史現場，捕捉當下的真實，而這個被拍攝的真實瞬間也永久的被記錄下來，形成了永恆，他們之間被視為前後因果的關係，因為攝影的存在，攫取了歷史的某個瞬間，而因時間不可逆的因素，那一個被拍下的瞬間即成了永恆，布列松談及了攝影這一藝術行為所形塑的真實性。

另一方面，布列松也曾如此說明記憶與真實的關係：「每張照片的記憶都與事件踩著同樣的步伐奔馳。」，在快門按下的瞬間，歷史與記憶、真實與永恆似乎被貫穿了起來，記憶

如此鮮明，如同真實事件的發生，他們就如同布列松所形容「踩著同樣的步伐」一樣，同步了起來。

作為 21 世紀的現代人，在觀看布列松攝影展時，我不斷被一張張黑白照片拖曳著進入不同的時間序裡，受到真實的場景、畫面，以及當時人民舉止神情的影響，觀賞一張圖片，我彷彿自身也交融進入了那個時間裡，能觸摸到當下，也能同理布列松按下快門時，他所謂決定性的瞬間(The Decisive Moment)，但當我再次尋著觀賞動線行走時，我又將思緒抽回至現實，這過程不斷反覆進行著，我可以清楚感覺到自己的思想隨著攝影作品在自由跳動著。

觀點一—文化中介者

然而，所謂攝影機拍下的真實是客觀真實嗎？於影像的最後一面白牆上，布列松給予了直接了當的答案：「事實並不有趣，事實的觀點才重要。」觀者在欣賞的作品，其實是攝影者文化凝視後的成品，照片中脈絡的呈現是人為意識控制後的展現，也因此，好的攝影師不只是一位拍照的人，更是位藝術創作者。

布列松貴為 20 世紀重要報導攝影大師，他的照片為的是報導，訴求傳遞真實情況，此次展覽中，從照片中可見他的鏡頭時常關注大社會底下，中國人民的樣貌，而這些樣貌的捕捉也能增加觀者對當時代的想像，其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照片有兩張，分別是圖一與

圖二，布列松為左下那張照片題上：「坐在食肆窗內的跑堂或店主，苦力在簷下用餐。」而右下那張照片他則寫下：「中國福利基金會，正在等待發放米的兒童」，當時中國經歷政治動亂、社會飄搖，儘管如此，階級的存在似乎不受撼動，苦力與資產階級之間距離依舊；而實際受到影響的則是兒童的生計與生活品質，孩子們為了自己的溫飽，在人龍中等待，國共內戰之下，珍貴的童年哪裡存在呢？照片中小孩看起來了無生趣，卻又接受現實的表情相當諷刺。

鏡頭聚焦之處正是布列松人文關懷的焦點。以上述兩張照片為例，布列松最讓我驚豔



圖一：布列松為照片題上：「坐在食肆窗內的跑堂或店主，苦力在簷下用餐。」。

的是，他於報導攝影領域中，將傳遞真實與個人觀點的比例融合的恰如其分，每張照片彷彿都在向讀者提出詰問，引導人們進行批判性思考，但照片中他個人觀點的展現，亦不會銳利到讓人無法直視或產生反感，他的報導攝影帶有溫潤的質感，他不只是攝影師、藝術家，更像是行走在歷史時空裡的影像詩人。

90歲的布列松在受訪時被問及：「人性中最喜歡什麼？」他回答：「誠信和直覺」，這兩個詞彙概觀了他的職業與攝影藝術的堅持。他為了貫徹誠信的原則，布列松要求技師如實地沖印底片，不得裁切格放和更改構圖。他抗拒戲劇化和煽動性的畫面，致力維持紀



圖二：布列松為照片題上：「中國福利基金會，正在等待發放米的兒童」。

實攝影的歷史價值和視覺質感；而直覺則體現在他攫取畫面的能力，正因為布列松帶著具有個人觀點/直覺的眼光，捕捉出的每一張照片都出自於他直覺性的快門揀選，儘管拍攝的是真實發生的事物，但畫面的攫取是他個人凝視的角度。

北美館館長林平所歸結：「布列松的報導攝影作品，凝視並捕捉上個世紀中國的轉變與遞嬗，亞洲近代歷史的發展線索於攝影畫面中隱然可見。」參加這場攝影展，我不僅認識中國 1945-46 以及 1958 年的曾經發生的歷史，也學習與感受布列松對報導攝影美學與技術的掌握與方法，再進一步思考，身為一個 21 世紀台灣人的我，透過策展人的整理與策劃，觀賞一位法國人的攝影展，從他的觀點了解 63 年前中國現代史上發生的動亂與變革，因傳播媒介、文化中介者的介入，跨越文化、歷史的資訊因而動態串連了起來，而身為觀者的我，則享受這些資訊與觀點在我眼前展演。

站在什麼角度思考，就會產生不同的觀點，布列松在文化創意產業裡頭，他扮演著文化中介者的角色。

後記

這一場展覽總共帶給我三個層面的迴響與啟發。

第一個是認識報導攝影的藝術，布列松富有藝術人文的攝影技術，走進中國變革的歷

史現場，將這些畫面保留下來，使後人能循著這些畫面，誘發想象，填補生不在其中，無法親臨過去的遺憾，也讓我了解報導攝影領域中對真實的捕捉、快門鏡頭下藝術的呈現，以及兩者兼容的可行性。

第二個是觀看這個展覽像是總結我在歐文所唸書、做研究的兩年時光，平常在課堂裡老師們教授的文化創意產業、文化展演、藝文展覽、文化中介者、文化媒介、歷史與記憶、真實性、真實性建構等等的學術概念，都在這個展覽中體現出來，增加我在欣賞展覽或參加文化活動時，分析跟觀察的角度，過程中也再次肯定我對文化創意產業的興趣。

最後一個，跟我個人成長比較有相關的事，布列松在攝影上的成就，讓我認知到作為一名媒體創作者的影響力是如此無遠弗屆，他選擇的媒介是相機，將過去的瞬間攝成永恆，廣為流傳，提供跨文化的觀點，也提供回顧過去的重要影像資料。文科生在就業市場一直不如商科、理工科來的吃香，我們的價值

與能力在於探討議題、認識文化、批判性思考、以及提出觀點，這些東西很難在市場被量化，因此在資本主義或國家發展為主的社會氛圍之下，研究文化的人總有被忽視，以及找不到自己定位的迷茫。

但當我觀賞展覽，深受布列松作品感動時，我被他的行為所鼓舞了，也瞬間解開一直以來我對文科生未來的困惑。在知識經濟下，最有價值的就是掌握知識與資訊的人，而人文科的優勢在於我們能快速分析脈絡、同理問題以及詮釋事情，只要選定適合自己的創作媒介，如同布列松選擇攝影機、李安選擇執導電影，便能將自身觀點透過媒體渠道或藝術形式向大眾分享，從中逐步產生出的影響力正是我們的價值所在，身為文化研究的應屆碩士生，我從布列松展找到成為一名文化中介者的理由。

(本文作者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碩士生)